

我在《阮自华与迎江寺振风塔》一文中叙述了阮自华与迎江寺、振风塔的渊源,从明代文献《雾灵山人诗集》中发现了迎江寺首任住持“选公”的信息,以及关于振风塔塔名“万佛塔”的最早记录。后在《振风塔,缘起双莲寺》一文中叙述了从怀宁务本堂《於氏宗谱》找到的阮鶚在嘉靖末年牵头将双莲寺古塔“万年塔”迁建于安庆城东门外观音港的记载,并将於唯一的忌日——明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九日——推定为振风塔的建成日。这些可以说无疑都是比较重要的发现,但阮鶚究竟是在哪一年着手迁建古塔的?阮自华为何要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募建”迎江寺?却都是更为重要的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项结权先生曾发现阮自华募建佛光寺和迎江寺的年份都与阮自华两个儿子的生年重合。查《阮氏宗谱》可知,阮自华长子以震,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七月生,顺治《潜山县志》明确记载佛光寺是明万历丁酉年由“桐城吴应宾、怀宁阮自华”在马祖庵旧址“请上勅建”;阮自华三子以观,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十二月生,康熙《安庆府志》《怀宁县志》均记载迎江寺是明万历己未年由阮自华募建。这种重合绝不可能是巧合,阮自华一生与佛教渊源甚深,当有其来历。

会不会与阮鶚迁建古塔有关?查《阮氏宗谱》可知,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六月初一日,这天比阮鶚小24岁的继室范氏为他生下一个儿子,这一年阮鶚虚龄54岁,从闽浙巡抚高位上被削职在家已有五个年头,烦闷日久,忽然老来得子、天降麟儿,定是大喜过望。这位“麟儿”就是阮

嬉子湖畔,清风徐徐,水波荡漾,鹰隼振翅,鱼游浅底。岸边一簇簇的萱草花,在绿叶的衬托下点亮了滩涂湿地和秋日长空,忽然想起王冕的《墨萱图》:

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堂下。南风吹其心,摇摇为谁吐?

慈母依门情,游子行路苦。举头望云林,愧听慧鸟语。

萱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在中国文化中被誉为“母亲花”。旧时游子远行,母亲常常会在庭院中种植萱草,以寄托对子女的思念,消解牵挂和忧愁,萱草因而成为母爱的象征。

满坡的萱草在风中摇曳。是谁把萱草的种子撒向这里?是谁把这里打造成了一片花海?它们又是为谁吐露芬芳?那一簇簇的萱草啊,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才能开出娇艳的花朵?那一朵朵黄花,又蕴藏着多少生存的秘密和生命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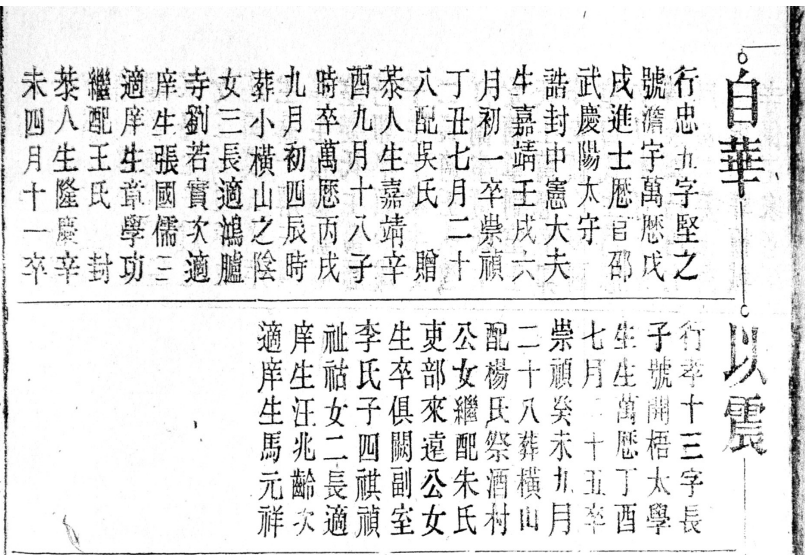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如此,植物亦如是。山水相依的嬉子湖孕育丰厚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里的苍生。那些如萱草一样的母爱,孕育的一批批走出去的游子,又如飞雁不断返乡,回归这片山水。桐城母教文化传奇而独特。“桐城好,母



■ 安庆地理

阮氏三代与振风塔

张全海 文/图



《阮氏宗谱》中的有关记载

鶚的幼子阮自华。不知道范氏在怀孕之前或怀孕期间有没有求过菩萨,也不确定阮鶚发愿迁建古塔是在阮自华出生前还是出生后,但可以肯定的是,古塔的迁建事件肯定与阮自华的出生有关。这一关联性可在阮以震的出生与佛光寺的“勅建”、阮以观的出生与迎江寺的“募建”事件上得到印证。

我们无法确定佛光寺的“勅建”是在阮以震出生前的几个月,还是出生后的几个月内;也无法确定迎江寺的“募建”是在阮以观出生前的几个月,还是出生的十二月当月。从常理

来说,阮自华发愿建寺当是在儿子出生后立即采取的行动。在重男轻女的时代,没有B超的鉴定,谁也无法准确预知生男生女的事情。烧香拜佛求子可以理解,但如果为了求子而屡屡修建寺庙则太过夸张了。

所以据上可以推定,阮鶚迁建古塔的动因当是阮自华的出生,其起始年份也当是阮自华出生的那年,即嘉靖四十一年。不管当年阮家有没有许下什么愿望,“麟儿”阮自华后来确实成为一位明末文坛的风流人物,成为安庆文化的祖师级人物。

阮自华在三子以观出生那年募建

迎江寺,当是承袭了乃父的遗志,阮鶚在幼子阮自华出生那年着手迁建古塔,至隆庆元年(1567)未竟而逝,阮自华便在三子出生那年募建迎江寺于塔基周边,以类似的举措来感应父亲当年的宏愿。也就在这一年,阮自华从户部郎官升任庆阳府知府,成为主政一方的四品官员,升了官,又生了儿子,父亲的冤屈也在几年前得以昭雪,自是人生最得意之时,此刻发愿建寺应该说最符合历史场景了。

阮自华次子以蒙,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九月生,四子以颐,天启五年乙丑(1625)十二月生。按阮氏的习惯做法,这两个儿子的出生,也当有修建寺庙庵堂的行动。遗憾的是,我查阅了安庆地区府县志书,没有找到相关线索。项结权先生推测阮以蒙的出生与阮自华修建怀宁黄梅山的黄梅庵有关,阮以颐的出生与阮自华修建怀宁普济庵的茶亭有关,但可惜均无文献证据支撑。

黄梅山是阮自华长期活动的别墅所在,他自号“雾灵山人”即缘于此山。阮自华在黄梅山建黄梅庵石濂阁、阮以震建黄梅溪阁,说明阮氏对此处别业十分重视,曾用心经营多年。所以说黄梅庵的修建,与阮以蒙的出生有关,当有其可能性。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须得用实地踏勘的方法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我曾几次赴怀宁宝灵山寻访阮自华的墓地,虽然已近咫尺,均因草木丛密,道梗不得进,只得作罢。今年深秋,我曾至黄梅山脚下“大桥头”,与三五友人约定,将在寒假草木枯萎时期上山,探查一下黄梅山的历史遗存,期待届时有更多的阮氏史料被发现,从而进一步强化阮氏三代与迎江寺振风塔的关联性。

■ 人文安庆

桐城的母教文化

徐亚红

氏更操心。有父作官还作客,教儿宜古更宜今,宵共补衣灯。”清代姚兴泉的《桐城好》写的正是桐城母教传统的故事。他在自注里说:“吾乡宦游与远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旧时桐城“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父辈出仕或幕游在外,子女多仰仗母教而成才。明代以来,桐城母仪典范凡十数则。方维仪教侄严如人师、吴坤元效画荻之教、姚夫人饥肠助廉、倪夫人教子明大义、张太宜人督课严等……她们不仅承担了一个个贤妻良母的角色,更是一位位耕读传家的践行者,卑微如萱草,爱却如星辰大海,深沉而辽阔。

桐城教子诗数不胜数,润物无声,润泽绵延。姚兴泉的“教儿宜古更宜今”,道出了桐城母亲重视子女的教育经典。除了德教以外,诗书教育也是桐城母教的重要内容。其代表性人物姚孔鏐之母张令仪,在丈夫姚士封逝世后独自教子并著有《蠹窗诗集》,诗集中多有与教子有关的诗篇。如《夜坐对诸子有作》:“工嫌婢情亲缝衽,学恐儿疏自授书。”孙临之妻方子耀著有《寒香阁训子说》三千余言,教子要敦本、积德、植品、读书。方子宣之妻姚凤仪,有诗云:“莫道一贫无长物,青箱旧业有家传。”勉励儿子忍守

清贫,继传书香门风。这些女性以诗文训子,不仅展现个人文学才华,更表达她们望子成龙的殷殷心愿和诗书润身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理念传递至今,如雨后春笋般教化后人。

每一位母亲的故事都是一部厚重的大书。时光流转,她们的故事至今依然鲜活。

在嬉子湖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曾有这样一位母亲,她叫苏蕙华,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后嫁与桐城名士江百川,育有三子。一日,长子兴汉从私塾归来,说师母要给孩子拼做五彩围兜,尚缺一块红绸布,他已答应带给师母。苏蕙华遍寻无着,便毅然剪下珍藏多年的红绸嫁衣衣襟递与儿子。此事终被塾师陈明起知晓,便登门致谢。苏蕙华说,我这样做是为教育孩子,一要尊师重教,二要言而有信,三要成人之美,一襟而全三教,不足为谢。明起先生闻此言,慨而赋诗:“古来女传古人编,今事惊人今应传。方诤宁馨为可畏,尤夸女士足称贤。新襟能剪裁行著,画荻堪名妇德全。来日驷坛知必颂,抛砖引玉我徒先。”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裁襟励子”故事。桐城自古流传“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

清晨弦歌琅琅”,耕读传家之风,由来已久。苏蕙华望子成龙、教子成人,不正是天下母亲共同的心愿吗?

随着“裁襟励子”故事代代相传,苏蕙华在故乡人心目中树立的教育理念和诚信风范也鼓励着她的孙女江觉迟。2005年,江觉迟自带资金踏上西部高原,创办草原孤儿学校,扶贫助学十五年,赢得藏族同胞的信赖与支持,当地人亲切地称呼她“扎西梅朵”,意为“草原上吉祥的花朵”。她还把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整理成小说《酥油》《雪莲花》《最后的女权王朝》等,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真实的生活底色。她用创作带来的全部收入无偿供养草原学校的孩子们,至今,她仍是藏区100多位孩子的“妈妈”。

2018年,她回到故乡嬉子湖,用七年时间建起一座“裁襟励子”文化园,独具匠心的布局,足见她对本土历史人文资源的挖掘如此用心用力。回乡几年,她先后出版了《桐城渔歌记忆》《邦金与梅朵》《帕米尔少年》《会唱歌的帐篷》等著作。在文化园渔文化馆,那一件件来自岁月深处的乡间什物、农具,唤醒了人们睽违已久的乡愁和耕读传家理念,深切地体会到一名当代作家兴建此馆的匠心与初衷。

萱草青青,萱花灼灼。此刻,“裁襟励子”文化园四周的萱草在秋日的阳光下更加绚烂多姿,它们不正是“裁襟励子”故事的最佳续篇吗?不正是祖母苏蕙华尊师重教的美德传承至今而开出来的绚丽之花吗?